



| 光明社科文库 |

# 济慈诗学观研究

徐玉凤◎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 光明社科文库 |

# 济慈诗学观研究

徐玉凤〇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济慈诗学观研究 / 徐玉凤著.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8. 8

ISBN 978 - 7 - 5194 - 4575 - 1

I. ①济… II. ①徐… III. ①济慈 (Keats, John  
1795 - 1821) —诗学观 IV. ①I561. 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00973 号

济慈诗学观研究

JICI SHIXUEGUAN YANJIU

---

著 者: 徐玉凤

责任编辑: 杨 娜 责任校对: 赵鸣鸣

封面设计: 中联学林 责任印制: 曹 靖

---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永安路 106 号, 100050

电 话: 010 - 67078251 (咨询), 63131930 (邮购)

传 真: 010 - 67078227,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 - mail: [yangna@gmw.cn](mailto:yangna@gmw.cn)

---

法律顾问: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龚柳方律师

---

印 刷: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

---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

开 本: 170mm × 240mm

字 数: 260 千字 印 张: 14.5

版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94 - 4575 - 1

---

定 价: 7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序

殷国明

得知徐玉凤的博士论文《济慈诗学观研究》即将出版,我是非常高兴的,一是体现了学术界对于徐玉凤多年来研究成果的肯定,二是正如一些专家学者在审阅此书原稿时所说,在济慈研究方面,徐玉凤这本专著确实有所开拓和贡献,为学界提供了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实属可喜可贺。

也正由于以上原因,当徐玉凤提出让我为这本书写序之时,我没有表示出什么犹豫就答应了。事实上,我自知没有什么资格为这部著作写序的,因为在济慈研究方面我几乎是个“门外汉”,尽管我也倾心于济慈的诗歌创作,也曾经是徐玉凤博士论文的指导教师,但是难免浮在表面,实际上提供的帮助极其有限;好在徐玉凤不仅是个有热情、有担当的女性学者,而且在学术研究中能够锲而不舍,孜孜不倦,虚心向有关专家讨教和学习,多方面吸取意见和资源,不仅打开了自己的学术视野,提高了素质和品味,也在济慈研究方面取得了不凡成就,不仅把济慈诗学推向了一个更为宽广的、整体性的研究向度,而且在资料和史料方面也有不少开新和发现,实为一篇近年来难得的、用功扎实和史料详实的博士论文。由此,我在这里分享徐玉凤学术成果的同时,还要感谢多位指导过徐玉凤的同仁同事,特别是傅修延教授,他们为这部专著的出版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

所以,就这部专著出版来说,我谈不上“雪中送炭”,只能摆出一副“锦上添花”的样子——因为徐玉凤还是一个讲情义的山东女子,既然我曾担任过她的博士导师,她肯定是要我为她这本书写序的,我之从命也是欣然的。

是为序乎?

殷国明

2018年5月18日于上海闵行新校区

# 目 录

---

## CONTENTS

序 .....	1
<b>绪 论 .....</b>	<b>1</b>
第一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	1
第二节 济慈诗学观研究意义 .....	16
<b>第一章 济慈诗学观的生发及其文化渊源分析 .....</b>	<b>23</b>
第一节 欧洲文坛——济慈诗学观生成的文化沃土 .....	23
第二节 英国浪漫主义——济慈诗学观形成的艺术摇篮 .....	30
第三节 先哲诗人——济慈诗学观产生的思想启迪 .....	40
第四节 希腊文化——济慈诗学观蕴育的历史来源 .....	49
<b>第二章 消释力:济慈诗学观的理论基础 .....</b>	<b>57</b>
第一节 梳理:“Negative Capability”的汉译释析 .....	58
第二节 辨译:是“消释力”还是“消极能力” .....	63
第三节 诠释:从译传学角度考察“Negative Capability”的艺术内涵 .....	68
<b>第三章 崇情:济慈诗学观的情感展现 .....</b>	<b>73</b>
第一节 情感的意蕴和表现 .....	73
第二节 情至深处——济慈的尴尬 .....	81

<b>第四章 美与幻的交织:济慈诗学观的想象之境</b>	88
第一节 “美”:“我热爱所有事物中美的本原”	88
第二节 想象:生发于美与真之间	96
第三节 “幻”:“天真的幻想把天下万物变成美的胜景”	107
<b>第五章 追寻:由自然诗学通向生态美学</b>	112
第一节 一切源于对大自然的崇与爱	113
第二节 济慈自然诗学观探微	118
第三节 济慈诗学观中生态美学的萌芽	124
<b>第六章 济慈诗学观对于世界诗歌发展的影响</b>	130
第一节 对英美诗人的影响	131
第二节 对中国现代诗人的影响	143
<b>结语</b>	155
<b>参考文献</b>	159
<b>附录一:“Negative Capability”在论文和专著中的中文释义汇总表</b>	182
<b>附录二:诗人眼中的诗人</b>	191
<b>附录三:前拉斐尔派以济慈诗歌为题材的画</b>	215
<b>附录四:济慈大事年表</b>	217
<b>后记</b>	219

# 绪 论

英国历史上自 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初的 20 多年是仅次于莎士比亚时代的另一个伟大时期,19 世纪的诗人们以才华横溢、诗作显赫创造了英国文学史上又一个难以企及的辉煌时代。

约翰·济慈(John Keats, 1795 – 1821)是 19 世纪初英国文坛的天才诗人,也是英国浪漫主义时期承前启后的一位重要作家。虽英年早逝,但他那短暂年华里迸发出来的奇光异彩却辉映了整个文学世界,给后人留下了无限的赞叹、惋怀和崇敬。济慈以他短短 6 年的创作生涯深远地影响着世代的艺术家,近两个世纪以来一直受到批评界的广泛关注。

## 第一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 一、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济慈及其诗学观的关注和研究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814 年至 1847 年。

1814 年,济慈写出了他人生的第一首诗歌《仿斯宾塞而作》(*Imitation of Spenser*)<sup>①</sup>。

① 关于济慈第一首诗歌《仿斯宾塞而作》(*Imitation of Spenser*)的写作时间,学术界一直存有争议,本文中说法的依据是 1958 年 Hyder Edward Rollins 编写的两卷本的《济慈书信集》(*The Letters of John Keats 1814 – 1821 (Two Volumes)*)中的“济慈生平”部分。此书信集是国外济慈研究者使用频率最高的济慈资料类文献。该书信集中对济慈这首诗歌做了备注,写明“有的资料将这首诗歌的写作时间记录为 1812 年”。

1816年,济慈的诗作首次公开发表<sup>①</sup>,同年,时任《观察家》(The Examiner)主编的李·亨特(Leigh Hunt, 1784–1859)撰文称赞济慈和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 1792–1822),认为他们的诗歌有着纯真的情感、别致的风格、清新自然的意象,代表着一种崭新的创作倾向。济慈的《初读查普曼译荷马史诗》(On First Looking into Chapman's Homer)一诗,得到了李·亨特很高的评价。

1817年,济慈出版了第一本诗集《诗歌》(Poems)。这本诗集是由雪莱出资,由奥利尔(Charles & James Ollier)出版公司出版。《晨报》(Morning Chronicle)和《泰晤士报》(The Times)上刊登了这一诗集出版的广告。

诗集出版后济慈得到了朋友们的肯定和赞扬。克拉克(Charles Cowden Clarke, 1787–1877)表达了对济慈诗集出版的赞扬:“济慈的第一部诗集终于在同行朋友们的急切期盼和良好祝愿中顺利出版了。”<sup>②</sup>另一位朋友海登(Benjamin Heydon, 1786–1846)在读完济慈的《初见额尔金石雕有感》(On Seeing the Elgin Marbles)一诗后,热情地对济慈说:“你的诗歌让我激动了一个小时,你的诗才将使我羡慕一辈子。”<sup>③</sup>

虽然诗集出版得到了朋友们的肯定、赞扬与鼓励,但诗集的销量并不好,基本都是赠送给济慈的亲朋好友。总体上说,济慈的第一部诗集并不成功。第二年,济慈又出版了《恩底弥翁》(Endymion),销量同样不好,而且一些极为苛刻的攻击性评论刊登在当时很有影响力的杂志《布莱克伍德杂志》(Blackwood's Magazine)上。

1820年7月,济慈在世时的最后一部诗集《<拉米娅><伊莎贝拉><圣亚妮节前夜>及其他诗歌》(Lamia, Isabella, The Eve of St. Agnes, and Other Poems)<sup>④</sup>出版。

鉴于前两次作品出版近乎失败的经历,济慈对这部诗集没有抱太大希望。但兰姆在《新时代》(New Times)、亨特在《指针》(Indicator)、杰弗里(Francis Jeffrey, 1773–1850)在《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上发表文章,都对济慈此次出版的诗歌予以好评。兰姆称赞济慈的《拉米娅》中有着非常丰富的意象和画卷般的故事,连《爱丁堡评论》的主编杰弗里也撰文褒奖济慈的诗歌“被强烈而浓厚的想

<sup>①</sup> 济慈公开发表的第一首诗歌题名为《哦,孤独!如果我必须和你同住》(O Solitude! If I must with thee dwell),刊登在1816年5月3日出版的《观察家》杂志上,署名为J. K.。

<sup>②</sup> Gittings, Robert. John Keats.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 Ltd., 1968:179.

<sup>③</sup> 傅修延:《济慈评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116页。

<sup>④</sup> Keats, John: Lamia, Isabella, The Eve of St. Agnes, and Other Poems. London, Printed for Taylor and Hessey, 1820.

象所映照”，诗歌之花灿烂多彩、美不胜收，即使一些晦涩难懂的地方，人们依然会被济慈甜美的诗句所带来的美妙感受迷醉。《爱丁堡评论》另有文章宣称：“如果济慈的作品算不上是诗歌的话，那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称为诗呢？”<sup>①</sup>

1823年，李·亨特又撰文对济慈的诗歌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给予济慈诗歌一分为二的评论。李·亨特指出在用韵之时，济慈有失之于雕琢之处，在选择词汇之时，济慈将词汇的视觉形式特征和词汇的音乐性放在了首位，而将其含义作为其次考虑的内容。李·亨特批评当时的文坛对济慈负面的评价是欠为妥当、有失公允的，他预言两三百年后，济慈的诗歌会大受欢迎。

李·亨特对济慈的评论是客观公允的，他对于济慈诗歌命运的预言也得到了证实。可惜的是，因为李·亨特的政治态度倾向于当时较为自由开明的辉格党，而且其言论较为激进，导致他不断受到来自保守的托利党党羽的抨击，并曾被捕入狱，度过了两年没有自由的铁窗生涯。由于济慈的诗歌得到了李·亨特的支持和好评，济慈也被保守的托利党人视为攻击对象，其作品遭到贬低，人身也受到中伤。直至济慈死后的二十余年，济慈的诗歌都没有引起一般读者的注意，可以说基本无知名度可言。

济慈诗歌在当时的不受关注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18世纪新古典主义诗学观念的影响延续到了19世纪，与济慈同时代的读者依旧青睐注重节制、讲求法则的诗歌，而且当时的社会弥漫着浓厚的革命情绪，而济慈的诗歌富于激情，侧重感官感受，着重表达梦境、幻境、想象世界、遥远思绪和对美的憧憬与向往，自然无法很快得到世人的欣赏和追随。济慈的第二部诗集出版后20年没重印过。

1829年，迦格利安尼编了一本济慈诗集在巴黎印行；1840年，在伦敦出版了一部济慈诗选。但两者的发行量都不大，没有产生多大影响。

### 第二阶段，1848年至1920年。

济慈及其诗歌、诗学观真正进入世人的视野、引起研究界的广泛关注是在1848年。

虽然早在1829年牛津大学辩题为“雪莱比拜伦更伟大”的辩论赛之后，大学生们就开始通过雪莱的《阿童尼》(Adonais)注意到了济慈，但整个社会对济慈并不了解。

1848年，米尔尼斯(Richard Monckton Milnes, 1809–1885)出版了《约翰·济

<sup>①</sup> 本段落材料来源：张鑫：《英国19世纪出版制度、阅读伦理与浪漫主义诗歌创作关系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41–142页。

慈的生平、书信与文学遗稿》(*Life, Letters, and Literary Remains, of John Keats*)<sup>①</sup>一书。这部著作的出版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济慈由默默无闻到声名鹊起的分水岭”<sup>②</sup>,该书正式让济慈走出了历史的尘封。

据不完全统计,1851年至1886年间,英国至少出现了27种不同版本的济慈诗选。在这个时期,济慈的影响凌驾于其他浪漫诗人之上,维多利亚时代的著名诗人几乎全都加入了颂扬济慈的大合唱,许多人把他当做浪漫主义运动最杰出的代表。

1861年,帕尔格雷夫(Francis Palgrave, 1824–1897)在维多利亚时期最有影响力的诗歌选集《英诗金库》(*The Golden Treasury of the Best Songs and Lyrical Poems in the English Language*)<sup>③</sup>中收录了济慈11首诗歌,这是济慈极大的殊荣。

1880年,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 1822–1888)在其《批评文集》(*Passages from the Prose Writings of Matthew Arnold*)<sup>④</sup>中对济慈做出了中肯的批评分析:济慈有着敏锐过人的感受力和洞察力,其行文风格清澈流畅而且极富音乐性,济慈同时具备得心应手地运用各种诗歌创作技巧的能力。他的论述中对济慈加以极为肯定的论述,并将济慈与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相提并论:“济慈和华兹华斯有着天赋的诗歌才华。”<sup>⑤</sup>很多论述还将济慈的名字写在莎士比亚之前。

1882年,英国诗人、戏剧家和批评家阿尔加农·查尔斯·斯温伯恩(Algernon Charles Swinburne, 1837–1909)在《不列颠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Britannica*)中的“济慈”这一条目里对济慈的描述承前启后、颇有新见,对济慈的概述叙论结合、内容涉及广泛。可以说,这一条目的描述是对整个19世纪的济慈研究取得成果的总结。

斯温伯恩通过分析认为济慈的诗艺是不断发展的,而且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便发展到了趋于完善的程度。他认为济慈在1817年出版的《诗集》(*Poems*)就整

<sup>①</sup> Milnes, Richard Monckton (ed.) : *Life, letters, and literary remains, of John Keats*. New York, G. P. Putnam, 1848.

<sup>②</sup> Matthews, G. M. (ed.). *Keats: The critical heritage*, London, Routledge and K. Paul, 1971: 31.

<sup>③</sup> Palgrave, Francis Turner (ed.). *The Golden Treasury of the Best Songs and Lyrical Poems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Cambridge; London; Macmillan, 1861.

<sup>④</sup> Arnold, Matthew. *Passages from the prose writings of Matthew Arnold*. London; Smith, Elder, & CO., 15 Waterloo Place, 1880.

<sup>⑤</sup> Arnold, Matthew. *Passages from the prose writings of Matthew Arnold*. London; Smith, Elder, & CO., 15 Waterloo Place, 1880:37.

体的艺术质量而言，并不是成功的作品，其中的诗歌模仿斯宾塞和华兹华斯的痕迹十分明显，而出版于 1820 年的诗集《*<拉米娅> <伊莎贝拉> <圣亚妮节前夜> 及其他诗歌*》(*Lamia, Isabella, The Eve of St. Agnes, and Other Poems*)<sup>①</sup>则表明济慈已经取得了非凡的艺术成就。斯温伯恩将这部诗歌集称为英国的最佳诗集之一。他首次肯定了济慈的颂诗在诗歌界的重要地位高于他的其他作品，认为济慈的叙事诗不如其颂诗有艺术价值和艺术成就。斯温伯恩同意阿诺德的观点，强调济慈的作品中充盈着与莎士比亚作品同样的一种气质，济慈所取得的艺术成就足以与莎士比亚相媲美。斯温伯恩认为只有将济慈在短短几年之中就成为旷世难觅的诗人，并迅速、全面地进入诗歌艺术创作的极境归因于济慈的天赋，这样的说法才站得住脚。

这一时期，济慈诗学观中的唯美主义美学观和艺术观得到了批评家们的肯定，但济慈诗歌中的政治性和人文关怀没有受到关注。对济慈及其诗歌的研究呈现出的另一个明显特征是受到关注的内容更为丰富，并触及一些之前未曾被关注的方面，例如济慈写作文体的逐渐演变等。很多画家在济慈的诗歌中找到了灵感，创作出了优秀的画作。英语中也开始出现“济慈派”(school of Keats)、“济慈式”(Keatsian)一类的说法。

第三阶段，1921 年济慈逝世 100 周年至 20 世纪末。

1921 年是济慈逝世 100 周年，很多国家举办了盛大的纪念仪式。各国文学评论家撰写了纪念济慈的文章。逝世 100 周年纪念过后，济慈的名字发出了更灿烂的熠熠光辉。这一时期，济慈在诗坛上的地位不断提高，济慈诗歌、书信得到了评论界越来越多的关注。批评家们不断采用新的理论和方法深化对这位诗人及其作品的研究，对济慈的认识逐渐达成共识，评论家们普遍高度赞扬济慈的诗才，承认其作品具有超凡的价值。济慈的生平被编成戏剧、写成小说，他的传记出版了一本又一本，他的诗歌被译成数十种语言，他的诗句被评论家无数次地分析研究。

除了继续作为画家的灵感来源之外，济慈的抒情诗还作为歌词，由艾伦·班德(*Ellen Bender*)谱曲，供女高音演唱，并配以长笛和竖琴演奏。济慈的名字进入了各类文学史，大学里开设了与他有关的课程，无数学生通过撰写以他为主题的毕业论文获得学士、硕士乃至博士学位。在 20 世纪，济慈获得了一位已故诗人可能获得的一切，人们几乎想不出还能再给他什么荣誉。

这一阶段的济慈及其诗学研究有以下特征：在新的批评模式和文学理论的影

<sup>①</sup> Keats, John: *Lamia, Isabella, The Eve of St. Agnes, and Other Poems*. London, Printed for Taylor and Hessey, 1820.

响之下,济慈的诗风和诗艺的发展、诗歌创作过程和其作品本身更为具体的特征开始得到更多的关注。随着精神分析学的问世,对济慈创作的研究也开始借鉴并采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这一分析方法。但对济慈进行的较为成熟的心理分析研究是到了20世纪的下半叶才出现的。这一时期,济慈诗歌的比较研究也取得了长足进步。

之后,执文坛牛耳达半个多世纪的新批评被引入了济慈研究。济慈研究以往侧重于宏观的评论,由于新批评的介入而开始转变为以微观分析和宏观评论相结合的研究状态。1947年,新批评代表人物克莱恩斯·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 1906—1994)在其影响广泛的《精致的瓮》(*The Well-Wrought Urn: studies in the structure of poetry*)<sup>①</sup>中,运用新批评最擅长的“细读法”,对包括《希腊古瓮颂》(*Ode on a Grecian Urn*)在内的10部名篇做了具体的文本分析,从微观层面证明了它们的卓越不凡。布鲁克斯将济慈的诗歌名化入他的作品标题中,意味着他对济慈诗作的极度认可。新批评派人士常以济慈作品为试金石,虽然其目的主要在于展示批评武器的锋芒,但很大程度上起到了扩大济慈影响的作用。对济慈诗歌批评而言,推动了其审美研究,但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从历史、社会、政治的角度对济慈诗歌的研究。

20世纪下半叶,济慈诗学研究在内容、方法、角度上,甚至在参照对象方面,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丰富性;各种相关著述在数量上也可谓空前。除此之外,研究也延续了20世纪上半叶已呈现出的一些研究特征,并在广度和深度方面不断有所进展,对济慈的研究逐渐由审美研究转向了历史研究。70年代,济慈诗歌批评仍延续传统观点,到了80年代,结构主义仍将济慈诗歌的美学定位投注在诗歌文本研究方面。在研究济慈的颂诗时,一些批评家明显与新批评派的评论家们所持的观点不同,他们选择从分析济慈的生活经历,尤其是其心理状态的变化着手,挖掘济慈和他创作的颂诗之间必然的内在联系。

20世纪60年代之后,济慈及其诗学研究显示出了更为强劲的势头,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1958年,罗林斯(Hyder Edward Rollins, 1889—1958)编辑出版了两卷本的《济慈书信集》(*The Letters of John Keats 1814—1821 (Two Volumes)*)<sup>②</sup>。该书信集是迄今为止收录济慈书信最为完整、最为批评家和研究者接

<sup>①</sup> Brooks, Cleanth. *The well-wrought urn: studies in the structure of poetr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47.

<sup>②</sup> Rollins, Hyder Edward (ed.). *The Letters of John Keats 1814—1821 (Two Volume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受的版本。该版本出版之后,很多研究者,如马塞洛·吉奥瓦尼利(Marcello Giovanelli)等人出版济慈相关的专著时,通篇参照、引用的都是这两本书信集。之后,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批评家之一布卢姆(Harold Bloom, 1930-)将其“再审视”的理论用于研究济慈及其作品。布卢姆在对济慈的颂诗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指出,英国诗人中,济慈的想象力是最健全的。

1973年,批评家们将济慈研究置于20世纪大的文学背景下,济慈和英国戏剧之间的联系首次得到关注。

1979年,杰罗姆·麦克甘(Jerome J. McGann, 1937-)的《济慈与文学批评中的历史方法》(*Keats and Historical Method in Literary Criticism*)从历史的角度出发,肯定了历史、政治、社会等因素对济慈诗歌产生的影响。

这一时期,济慈创作中的幽默也引起了研究者们的关注。

在20世纪80年代的济慈研究中,范德勒(Helen Vendler, 1933-)以女性特有的缜密和敏感,从创作心理、创作背景和文学传统的影响和诗歌的技巧运用等多个角度,对济慈的颂诗进行了令人信服的探析。如她在1983年出版的《济慈的颂诗》(*The Odes of John Keats*)<sup>①</sup>等研究作品。

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很多其他的优秀作品。1986年,杰弗瑞·贝克(Jeffrey Baker, 1925-)的《济慈与象征主义》(*John Keats and Symbolism*)<sup>②</sup>探索了长久以来济慈研究中被忽视的一面。书中不仅分析了济慈诗歌中夜莺、古瓮等有象征意义的事物,也解析了“拉米娅”等有象征意义的名字。贝克认为济慈通过创造一个有着强烈象征意义的世界,并置身其中、发挥其卓越的想象,来描绘人类永恒的梦想和追求美好未来的心灵,借此缓解和宽慰现实中的苦痛。

20世纪90年代的济慈研究又表现出一些新的动向,其主要特征是内容更新、范围拓宽、视野扩大。这一时期,当时流行的女权主义批评被引入济慈研究。

1994年,贝内特(Adam Bennett)又将济慈研究引入另一个新的领域,即所谓的“作品在作家去世后的生命”。

第四阶段,2000年至今。

进入21世纪后,对济慈的研究更呈现出多角度和多样化的特点,研究热度虽不及第三个阶段,但不断有新的研究力作出现。

<sup>①</sup> Vendler, Helen. *The Odes of John Keats*.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sup>②</sup> Baker, Jeffrey. *John Keats and Symbolism*. Brighton, Sussex: Harvester Pres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6.

2000年,克里斯汀森等人(Allan C. Christensen, Lilla Maria Crisafulli Jones, Giuseppe Galigani, Anthony L. Johnson)编辑出版了《济慈的挑战:1795—1995年两个世纪论文集》(*The Challenge of Keats: Bicentenary Essays 1795—1995*)<sup>①</sup>。编者在书的引言中阐明该论文集定名为“济慈的挑战”是专家学者们想借济慈200年诞辰之际,给毋庸置疑的最伟大诗人之一的济慈以最高程度的崇敬,也接受济慈研究在未来给予我们的更多新的挑战。2009年,由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获奖女导演简·坎皮恩(Jane Campion, 1954—)执导的描述济慈爱情故事的传记电影《明亮的星》(*Bright Star*)播出后,济慈和他的作品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

2012年,巴里(Shahidha K. Bari)出版了《济慈与哲学:感知的生活》(*Keats and Philosophy: The Life of Sensations*)<sup>②</sup>一书。该书通过对济慈一些著名作品和几首鲜为读者注意的作品的分析,从5个方面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触觉的本质、存在的召唤、生态诗学、自由的思考和悲伤的分量。每一章在多角度的争论中阐释一首诗歌或几首相互分离、没有连续性的诗歌。同年,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尼古拉斯·罗伊(Nicholas Roe)的《济慈的新生》(*John Keats: A New Life*)<sup>③</sup>。在济慈传记已无以计数之时,罗伊展示给读者一个崭新的济慈。印第安纳大学的肯尼思·约翰斯顿(Kenneth R. Johnston)为该书写了书评,对该书的出版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2013年,马塞洛·焦瓦内利(Marcello Giovanelli)出版了《文本世界理论与济慈诗歌》(*Text World Theory and Keats' Poetry*)<sup>④</sup>一书,书中分了十个章节,用文本世界理论对济慈诗歌进行了翔实解读,为济慈诗歌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

除了专著,对济慈及其诗歌、诗学观进行研究的论文也层出不穷。世界各国的学者对济慈及其诗歌、诗学观进行探讨和论述的评论文章中以英文文章为最多。

1986年,杂志《济慈雪莱评论》(*The Keats-Shelley Review*)的刊出是评论界给予济慈的极大肯定。该杂志至今仍刊登济慈、雪莱研究领域里的优秀文章,对济慈和雪莱诗歌的研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sup>①</sup> Christensen, Allan C. ; Jones, Lilla Maria Crisafulli; Galigani, Giuseppe; Johnson, Anthony L. *The Challenge of Keats: Bicentenary Essays 1795—1995*. Amsterdam; Atlanta, GA: Rodopi, 2000.

<sup>②</sup> Bari, Shahidha K. *Keats and Philosophy: The Life of Sensa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sup>③</sup> Roe, Nicholas. *John Keats: a new lif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2.

<sup>④</sup> Giovanelli, Marcello. *Text World Theory and Keats' Poetry: The cognitive poetics of desire, dreams and nightmares*. New York: Bloomsbury Academic, 2013.

2004 年至 2004 年,国外发表在各类刊物上的济慈研究的英语论文约为 69 篇。

2012 年,弗兰克·布伦南(Frank Brennan)发表论文《约翰·济慈与维尔浮莱德·欧文——早亡、神秘和对真的诉求》(*John Keats and Wilfred Owen – Mortality, mystery, and the pursuit of truth*)<sup>①</sup>。论文对照评论了两位早亡的诗人,他们都在各自的世界里探寻着真与美。

2013 年,巴斯卡拉(R. Baskaran)的论文《约翰·济慈和罗伯特·弗罗斯特——不逃避现实的浪漫主义诗人》(*John Keats and Robert Frost – the Romanticists sans Escapism*)<sup>②</sup>由济慈的《夜莺颂》(*Ode to a Nightingale*)和弗罗斯特(Robert Frost, 1874 – 1963)的《白桦树》(*Birches*)入手对比分析了两位诗人,论述他们的诗歌是浪漫主义的,但并非是逃避现实的。同年,拉胡尔(Rahul Dhankhar)发表的《济慈的十四行诗:批评概述》(*Sonnets of John Keats: A Critical Overview*)评析了济慈 1814 年到 1819 年所写的 64 首十四行诗。

2014 年,罗恩·菲什曼(Ron Fishman)发表了文章《约翰·济慈(1795 – 1821):一名外科医生》(*John Keats (1795 – 1821): Physician and Surgeon*)<sup>③</sup>。文章分析了济慈从医的经历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济慈于 1816 年得到了外科医生的行医执照。此后虽然诗歌以更大的吸引力让济慈弃医从文,但从医的经历化为记忆留在了济慈的生命里,在其之后的诗歌创作中,尤其是 1818 年创作的《夜莺颂》中留下了从医的深刻印记。

## 二、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的济慈诗学研究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 世纪上半叶从最初译介到接受的阶段。

在中国,济慈的名字最早出现在鲁迅笔下。1907 年,鲁迅在用文言文写成的文论的《摩罗诗力说》中虽未详细介绍,但论述间提到了济慈:“契支(John Keats,今译为济慈),虽亦蒙摩罗诗人之名,而与裴伦(今译为拜伦)别派,故不述于

<sup>①</sup> Brennan, Frank. *John Keats and Wilfred Owen – Mortality, mystery, and the pursuit of truth. Lessons for palliative care*, Journal of Palliative Care, 2012, Volume 28, Issue 2, pp 116 – 119.

<sup>②</sup> Baskaran, R. *John Keats and Robert Frost – the Romanticists sans Escapism*. Language In India, September 2013, Vol. 13:9, pp. 71 – 77.

<sup>③</sup> Fishman, Ron. *John Keats (1795 – 1821): Physician and Surgeon*. American Journal of Ophthalmology, 2014, Volume 157, Issue 2, p 463.

此。”<sup>①</sup>1981年版的《鲁迅全集》中“契支”有一条注释：“他（济慈）的作品具有民主主义精神，受到拜伦、雪莱的肯定和赞扬。但他有‘纯艺术’的、唯美主义的倾向，所以说与拜伦不属一派。”<sup>②</sup>

1921年，在济慈逝世100周年纪念之际，在英美文学界轰轰烈烈纪念济慈之时，国内杂志刊物也刊登了不少与济慈相关的文章。1921年4月25日，《东方杂志》第18卷第8号上发表了愈之的《英国诗人克次的百年纪念》，较为详细地介绍了诗人济慈。

1921年出版的《小说月报》第12卷第5期刊登了沈雁冰（原署名为雁冰）的卷头辞《百年纪念祭的济慈》<sup>③</sup>，其中评价济慈为“集前人大成”者，可“做后代先锋”，并写到他的感想不是着眼于济慈的才能，而是在他的命运。济慈一生潦倒，真可谓是命懃的诗人，济慈在生前默默无闻，在其死后也受尽冷漠，而且受尽误解，比惠特曼（Walt Whitman，1819—1892）和马克·吐温（Mark Twain，1835—1910）更为可悲，进而感慨：“天才多不能于生前享大名，这原是万古同慨的事。”<sup>④</sup>

同年的《小说月报》第12卷第6期刊登了沈雁冰的《海外文坛消息：（六十八）伦敦举行济慈百年纪念展览会的盛况》<sup>⑤</sup>一文，介绍了在伦敦举行的“济慈百年纪念展览会”。

此后，济慈的诗歌陆续被译为汉语，评论文章也相继出现：徐志摩的名篇《济慈的〈夜莺歌〉》，傅东华的《英国诗人济慈》，费鉴照的一组文章《济慈的一生》《济慈美的观念》《济慈心灵的发展》等都较为翔实地评介了济慈的思想与诗歌创作。

1922年，《小说月报》发表了苏曼舒翻译的济慈和勃朗宁的诗。

1927年的《光华周刊》第2卷第8期上刊登了余志通发表的《济茨J. Keats的美说》，文章第一句写道：“谁不知道《夜莺歌》‘Ode To A Nightingale’，谁就得永远离开诗的国度。”<sup>⑥</sup>虽然这种说法太过绝对，不能仅以一首诗歌的知道与否判定人们在诗的国度的去留，但还是反映出了济慈的诗歌在当时的接受程度和人们的喜爱程度。这篇文章中对济慈的美和想象做了分析、解读。这篇论文是中国研究者

<sup>①</sup> 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83页。

<sup>②</sup> 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08页。

<sup>③</sup> 雁冰：《百年纪念祭的济慈》，《小说月报》，1921年第12卷第5期，第7页。

<sup>④</sup> 雁冰：《百年纪念祭的济慈》，《小说月报》，1921年第12卷第5期，第7页。

<sup>⑤</sup> 沈雁冰：《海外文坛消息：（六十八）伦敦举行济慈百年纪念展览会的盛况》，《小说月报》，1921年第12卷第6期，第127页。

<sup>⑥</sup> 余志通：《济茨J. Keats的美说》，《光华周刊》1927年第2卷第8期，第4页。

首次从美学角度解读济慈诗歌及其诗学思想。

1942 年抗日战争期间,英国现代诗人燕卜荪博士(William Empson, 1906—1984)来中国教书,也曾在课堂上传播和讲授济慈,进而影响到了查良铮、王佐良、朱维基等翻译研究人员。这一时期出版的各种诗集、诗选里大都收录翻译了济慈的诗歌。

这一时期常有汉译的济慈诗歌和济慈的书信发表在当时的《语丝》《诗创作》《小说月报》《京报副刊》《西洋文学》等刊物上。朱湘翻译了济慈六首诗歌,其中的一首为《圣亚妮节之夕》<sup>①</sup>,被誉为字字如金。受济慈影响,朱湘还创作了中国的“十四行诗”,被誉为“中国的济慈”(具体论述见本书第六章第二节)。济慈诗歌对中国新诗的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

这一时期济慈相关评论文章也时有发表,1948 年,朱有琮的《济慈和他的夜莺歌》<sup>②</sup>在《读书通讯》上发表,文章评述了济慈凄楚的身世和他从医的经历,并从五个方面解析了济慈的《夜莺颂》。

1958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查良铮翻译的《济慈诗选》,该诗选是最早的济慈中译本诗歌集。

这一阶段,对济慈诗歌的研究几乎都是审美研究范式,许多评论家们在研究中指出,济慈的诗歌是远离政治、远离生活的,其诗歌主题与社会无涉,与时局无关。

第二阶段,20 世纪 80 年代的阐释高潮至 20 世纪 90 年代深入探讨济慈诗学美学价值的阶段。

这一时期,济慈诗歌研究展现出蓬勃的生机。研究主要有两大明显的主流范式:一是审美研究,通过研究揭示济慈诗歌内在的美学价值;一是历史研究,分析挖掘济慈的诗歌与他生活时代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动向之间的外在关系。前者的研究中济慈是一个现实生活的规避者,而后者的研究认为济慈是世俗生活的见证人。这两大研究范式相辅相成,如火如荼地展开,使济慈诗歌研究彰显出无穷魅力。

1981 年,朱炯强在发表于《外国文学研究》上的《露珠培育出来的鲜花——谈约翰·济慈和他的抒情诗》<sup>③</sup>一文中提出济慈不是颓废的浪漫主义作家,他对社

<sup>①</sup> 英文诗题目为: *The Eve of St. Agnes*, 本书中将该诗题名译为《圣亚妮节前夜》。

<sup>②</sup> 朱有琮:《济慈和他的夜莺歌》,《读书通讯》,1948 年第 164 期,第 19—20 页。

<sup>③</sup> 朱炯强:《露珠培育出来的鲜花——谈约翰·济慈和他的抒情诗》,《外国文学研究》,1981,(4):70—73.